

陕西袁家村跨地方的乡村性生产与呈现

黄清燕^{1,2,3}, 白凯^{1,2,3}

(1.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西安 710119; 2. 陕西省旅游信息化工程实验室, 西安 710119;
3. 陕西省旅游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 西安 710119)

摘要: 以陕西袁家村“进城开店”这一典型跨地方扩张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 基于对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内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店铺经营者、消费者、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 探究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袁家村乡村性的建构和演变。研究发现: ① 袁家村的乡村性嵌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 并呈现历时性变化, 也即乡村性并非是固化的结果, 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 ② 袁家村跨地方生产过程是乡村发展升级助推下, 乡村物质、人、制度等因素超越地域边界的流动过程, 此过程也是乡村与城市之间亲缘、业缘、地缘多重关系的整合; ③ 袁家村跨地方的过程以饮食生产扩大呈现了袁家村的乡村性, 具体包括乡村生活、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等内容, 而乡村性在城市空间成功延续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扩张、标准化生产的转移和符号化空间的营造实现; ④ 乡村性是社会建构的, 强调不同群体对乡村的意义创造。袁家村“进城开店”超越了乡村地域边界, 却与农业、土地、村集体呈现更深刻的强关联, 有力回击了“村落的终结”“乡村性终结”等论断。研究认为, 从多元、动态、融合的视角理解乡村性, 有助于在复杂的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把握更原真的乡村性, 为乡村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探索提供新思考。

关键词: 乡村性; 跨地方; 原真性; 符号化; 袁家村; 陕西

DOI: 10.11821/dlyj020190360

1 引言

资本和市场经济改写了中国乡村原有的社会文化基础^[1], 传统的乡村生活并未被现代化进程简单、粗暴地终结, 乡村文化对现代化冲击的多元反应诱发了“乡村性争论”(rurality debate)^[2]。全球范围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互动与整合, 乡村性随之被放置于“多元主体、多重尺度与交织流动的关系之中”^[3,4]。新乡村发展现实也促成了由流动所建构, 超越地理空间、特定形式的“乡村性”^[5], 侧重于强调乡村性为多元与异质的生产和再生产动态过程^[6]。乡村性逐渐成为乡村地理学、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7,8]。

乡村性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进入西方乡村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以来, 历经描述流派、乡土流派、社会建构流派地探索和发展, 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乡村性不是僵化的地理实体, 也不是先存的客观特性, 而是乡村社会、空间关系相互建构交织的结果, 是动态的、变化的, 不断经由多样化、冲突性的社会建构^[9]。20世纪90年代末, 国内乡村地理研究引入乡村性概念^[10], 并对其内涵界定、形成机制、评价与测度进行了探究, 从

收稿日期: 2019-05-04; 修订日期: 2019-10-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44); 文化和旅游部万名旅游英才计划: 研究型英才培养项目(WMY-C2017103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9TS010)

作者简介: 黄清燕(1992-), 女, 陕西安康人,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乡村地理。

E-mail: hqy1992@snnu.edu.cn

通讯作者: 白凯(1974-), 男, 陕西西安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者行为与社会文化地理。

E-mail: bkshaanxi@163.com

宏观尺度的乡村地域分析佐证了乡村性概念与内涵的不断变化^[11]。纵观国内外关于乡村性的研究,对于微观尺度乡村性的建构和演化过程尚不明晰,亟需实证研究进一步探索分析,尤其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进入到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乡村性”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界定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乡土社会”^[12],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乡村性的根植、存留、演变以及再造,亟待研究加以回应。Augé指出,地方性来自地方的分层/再分层(stratification/res-stratification)过程^[13],同理,乡村性也来自于乡村的分层、去层、沉淀,逐渐从地理空间中解放出来,延伸和渗透到城市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14,15]。Chung研究表明,在乡村快速转型和重构过程中,自给自足和集体系统的延续,成为中国乡村性最主要的内容^[16]。以上述观点为研究起点,本文选择陕西袁家村“进城开店”这一典型跨地方扩张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试图厘清袁家村的乡村性内涵,聚焦于乡村性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生产与消费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实现保持、流变与建构的动态过程。本文尝试对乡村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出有益补充,以期丰富乡村性的理论内涵,为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2 理论基础

2.1 乡村与乡村性

由于“乡村”概念的复杂性,导致其在不同研究典范中的释义不尽相同。早期的研究将乡村视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存在,等同于“非城市地区”的空间地域形态,部分学者通过人口阈值(population thresholds)、人口密度(density)、土地利用(land use)、不透水面层(impermeable blanket)、地理距离(distance)为指标体系来界定乡村的地理界限^[17]。随着城乡连续体概念的出现与发展,Rodgers等学者逐渐认识到乡村不是均质的,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连续谱^[18],这一界定打破了以往从空间界限对乡村的定义,逐渐转向从乡村人口、场所和地域等功能要素总结乡村特征。Cloke从功用性视角总结了乡村的三大特征,即土地利用以农田与林地为主、建筑景观以小团体聚居、居民生活方式与行为由居住环境中凝聚而成^[19,20]。

乡村性由乡村概念发展而来,其构成与影响被乡村地理学、乡村社会学、乡村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加以探索和分析。早期学者致力于通过量化指标来表述乡村性,如Cloke提出的乡村性16大测量变量^[20],Harrington和Don的乡村性结构性指数(structural index)与人口性指数^[21]等,这一时期,学者们停留在乡村性外显化维度构成研究,对于乡村性概念内涵、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等有所忽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Mormont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切入,指明乡村性是一个概念的集合体,暗含着描述乡村地域实体和乡村社会特点的话语,源自于一系列意义的社会生产,即乡村性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与产物^[22,43-44]。学者Halfacree沿此脉络,提出以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理论对乡村性定义补充完善,表明乡村性是指一切表征乡村的物质与非物质构成^[23]。受列斐伏尔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重体的启发,Halfacree进一步提出了乡村性四维结构模型,具体包括:①乡村话语(lay discourses of the rural),即人们乡村生活中所使用的有意无意的交流方式,趋向于乡村的语言系统;②乡村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是指乡村被资本利益、政策制定者、科学家、规划师根据某种秩序建构乡村空间的方式;③乡村的日常生活(lives of the rural),指构造乡村日常现实的空间实践;④乡村地区

(rural locality), 指乡村空间的表征和乡村的日常生活共同建造和嵌入的地域空间^[23]。

Halfacree 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的乡村性空间, 超越过往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二元概念, 由此开始, 乡村性的界定从乡村的物质性转向乡村的社会表征, 并与人们的行为、乡村生活经验密切相关^[24]。在社会表征视角下, 乡村地区与乡村性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Murdoch 等指出应关注乡村性的表征和乡村地理空间相分离的趋势, 换言之, 研究者应聚焦于乡村性在实践中被建构和使用的方式^[25]。Gray 指出乡村的生产和消费是乡村地区到乡村性意义化的过程, 是链接乡村想象与乡村的关键点, 乡村性并非是乡村的替代, 而是对乡村地区关于乡村想象层面的补充^[26], 乡村性包括了乡村地区的可识别特征和乡村地区的文化意义^[27]。Cloke 结合前人研究, 从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建构对乡村性进行了综合界定, 认为乡村性是与城市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农业占据独特位置的经济结构、乡村不同角色共同演绎构成的^{[19][21]}。

在现代性异化与本土性守护的互动博弈中, 许多国家的乡村都经历着剧烈的变迁与重构^[28], 在此背景下乡村的本土性不容忽略^[29]。Chung 指出, 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 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经验的模式, 民工荒和空心村的同时出现, “村落终结”的广泛讨论, 乡村、农村、村民的多重表述, 既表明了中国乡村的复杂性, 也要求对中国的乡村性作出明确的定义。他认为, 自力更生和集体制度两种空间实践嵌入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刻画和持续构建现代化的新乡村性, 这种乡村性与村民新的生活实践和生活经验交织在一起^[16]。乡村性的概念、外延、构成维度尚未达成共识, 系统的实证案例研究相对匮乏, 但可以确认的是, 乡村性是多维度的, 日益呈现出更多元的表现形式。目前, 由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加速, 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面临着剧烈变动, 为“乡村性”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实证案例研究地。

2.2 跨地方与跨地方生产

地方从未完成, 总是处于流变之中、过程之中^[30]。Seamon 认为, 相对于根植性和原真性, 流动性对于理解“地方”的概念更为关键, 强调地方意义镶嵌于人类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意动^[31]。受到流动性的深刻影响, 地方不再是内生的、僵化不变的^[32], 也并非是先验的、界限的和永恒的, 而是动态的、关系化的。要理解地方, 必须以彻底开放并非本质化的方式来思考地方^[33], 关注地方的内外系统的交互和关联, 将地方和地方的意义置于流动网络中去考量。

Grillo 用“跨地方 (translocal)”这一概念概括了地方的流动性和地方内外系统关联与连接的形式与途径^[34], 而学者 Oakes 直接将“跨地方”定义为“地方与流动”^[35], 阐明跨地方是地方要素的流动以及对地方边界的突破。跨地方研究的兴起促使地方的研究更为开放、多元, 突破了以往地方研究“区域”的局限, 更为深入地捕捉到地方与流动之间的动态含义。Brickell 和 Datta 强调跨地方是流动和不流动的人口基于地方化场景和日常生活实践共同创造“物质化、空间化和具象化”的地方^[36]。值得注意的是, 跨地方所强调的“地方”, 并非是单一的“节点”, 而是包含了复杂的“人-地”“地-地”关系并具有文化意义解构、建构与重构的地方^[37]。

跨地方的核心是探究移动、迁移和流动如何促使不同空间之间产生关联和连接, 通过流动和移动, 地方被延伸到原有的边界范围之外, 通过个体建立日常互动, 最终转换为跨越地域的地方, 这种转换包含了强烈的时间动力和空间轨迹^[38]。就其本质而言, 跨地方是一种对地方边界的“超越”, 与本地与他地之间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网络紧密联系^[39], 在互动和发展、保持和改变中, 根植着原有的地方特性, 同时积累和构建新的地方内涵, 促使地方性在地方与地方互动^[40]中发展重构。

跨地方是人、资源、实践、思想在地方网络中流动的过程^[41], 而跨地方生产则是通过空间布局分散化形成跨区域的生产链条和生产体系^[42], 是生产体系在多个区位的地方重叠和空间重组, 是原地方与新地方文化汇融的过程^[43]。跨地方视角下的生产, 不是生产活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简单迁移, 而是生产活动在空间扩散与地方力量博弈的过程中, 与不同地方之间建立持久和切实的联系。通过跨地方生产的过程能够打开地方经济的黑箱, 直观刻画地方经济活动组织的内部机理, 进而突破地方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限制条件以提升地方产业整体竞争力^[44]。

基于此, 本文结合乡村性的具体内涵以及跨地方的理论论述, 形成对陕西袁家村跨地方乡村性生产与呈现分析。乡村性的演化并非单一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历史累层, 也关联着乡村以外的其他地方。审视本文所选择的实证案例——袁家村“进城开店”, 是袁家村生产经营活动跨地方的现实实践, 伴随“人-地”关系的强化、瓦解亦或重构, 乡村性在“乡村与城市”“流动与根植”“复合与单一”多维交叉关系中更加复杂多元。综合乡村性和跨地方的研究, 能够更加明晰乡村性与乡村内外部系统的社会关联。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概况

袁家村地处关中平原腹地, 背靠九峻山, 毗邻唐昭陵。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 很长时间内束缚着袁家村的发展, 袁家村因此成为昔日闻名的深度贫困村。穷则思变, 1970年冬, 袁家村第36任队长郭裕禄上任, 带领袁家村人建设农田水利、大搞养殖, 走出贫困桎梏, 实现从贫困农村向农业兴村的第一次历史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 袁家村形成了以建材业为主的乡村工业体系, 实现了由农业兴村向工业富村的重大变革。进入新世纪, 袁家村着眼于“关中小吃”和民俗文化, 投资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 着力推进乡村旅游, 一度成为国内乡村旅游发展借鉴的典范, 实现了村落发展的第三次华丽转身。

产业愈发繁荣, 为了突破地域面积的围限, 袁家村整合了周边东周村、西二村等十个村来壮大自身产业发展格局。声名鹊起之下, 袁家村转而进入西安餐饮市场。2015年8月, 袁家村进驻西安市曲江银泰城, 开业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体验店内选取30种全村最具代表、最受欢迎的小吃生产经营, 具体包括包子、牛肉饼、菜疙瘩、煎饼、饅络、涮锅油饼、油糕、清炖羊肉、生汆丸子汤、biang biang面、锅贴、卤肉、蒸馍、烩菜、臊子面、手工米线、豆腐脑、水饺、鲜榨果汁、捞凉粉、菜合、凉皮、醪糟、驴蹄子面、搅团、浆水鱼鱼、烙馍、蜂蜜粽子、粉汤羊血、肉夹馍。此后, 陆续在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咸阳正兴广场、西安砂之船奥特莱斯、西安华东万和城、西安盛龙商业广场、东方亿象城等商场开设体验店。在地方与地方, 乡村与城市的纠葛中, 袁家村村民、农业、土地、乡村生活等乡村构成要素以高度分散的方式存在, 成为了典型的“流动中的地方”, 为本文研究乡村性在跨地方过程中的留存、变迁提供了绝佳场域。

3.2 研究方法与过程

袁家村“进城开店”的跨地方生产实践是乡村与城市持久性、复杂性的联结过程, 通过生产活动在地方之间的流动, 袁家村本村的产业被纳入到城市的生产体系^[45]。相对于问卷等抽样统计方法, 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更能捕捉到生产与地方之间的动态关系, 完整地呈现乡村性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参与式观察最早由Linderman提出^[46], 能够直接获取研究设计所需要的分析材料, 同时有助于理解调研地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功能关系。访谈是一种为特殊目的而进行的谈话(研究者与被访问

者),主要着重于受访者个人的感受(perception of self)、生活与经验(life and experience)的陈述,藉由彼此的对话,研究者得以获得、了解及解释受访者个人对社会事实(social reality)的认知^[47]。

基于地缘关系和咸阳规划项目的便利,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笔者多次进入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曲江银泰店、小寨赛格店、东方亿象城店),运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辅以查阅袁家村历史文献资料,以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的店铺特征、装饰、食品、操作过程等物质内容和店铺经营者、管理者和消费者对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的感知评价等非物质内容形成对袁家村跨地方生产清晰认识。共计访谈店铺经营者14人,消费者10人,管理人员4人,获得访谈文本4.53万字。为了更加清晰地对比分析城市体验店与袁家村的差异,笔者先后3次到访了位于咸阳的袁家村,并通过微信与当地村官Y女士保持长久地联系和持续地追踪。本文在整理原始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对访谈对象以“群体类型-性别-访谈顺序”进行编码,其中群体类型中JY代表店铺经营者、XF代表消费者、GL代表管理人员;M代表男性,F代表女性,如JYM1表示第一位男性店铺经营者被访谈对象。

4 袁家村跨地方的乡村性

4.1 袁家村乡村性的演变历程

“乡村性”研究的代表人物Mormont在1990年指出,乡村性的存在与呈现来自人们的建构与重构,也即乡村性是多元群体的主观创作^{[22]21-32}。地理流动不断加剧,乡村不再保持单调和停滞的状态,而是在混杂中保持自己的特色,成就了乡村性的主体特征。乡村性由乡村延伸而言,根植于乡村特色的生活、生产、社会建构之中^[48]。具体而言,袁家村的乡村性演变主要历经了3个阶段:

4.1.1 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中传统农耕生产主导下的乡村性 袁家村地处关中平原的丘陵沟壑区,耕地多分布在古河道上,土地盐渍化、沙化严重,耕地破碎、零散,仅能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形成了以自耕农占主体的关中农业生产^[49]。传统农业生产落后、封闭,整个生产全靠个体人力完成,使用的工具也极其简单,以石滚子、扁担、锄头、镰刀最为常见。其他产业的发展基本为零,村民收入来源十分单一,饥寒和贫困严重困扰着袁家村的每一位村民。村民们居住在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和低洼潮湿的地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休”是农耕节律下村民们生活最直接的概括。“从土里刨食”使村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村民依赖于土地自给自足,同时囿于土地的限制,村民们世代稳居在袁家村内,因而形成了“大家族”的复杂家庭结构。村民之间多为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彼此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族长、乡规、祠堂成为约束村民行为的主要力量。此时,袁家村的农业、土地、村民、乡村生活高度聚合,形成了一种依附土地、以农为本,强调血缘关系、代际传承^[50]并具有“独立封闭社会边界”属性^[51]的闭合式乡村性。

4.1.2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乡村集体企业生产主导下的乡村性 自20世纪70年代伊始,袁家村开始探索农业之外的发展,从扩大养殖、建水泥厂,到建立比较发达的乡村工业体系,逐渐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袁家村人从难以温饱变得有粮吃、有钱花,生活逐渐富裕起来。随后,袁家村组建集团公司,将内部的村民群体整体纳入到企业生产之中形成村企合一,乡村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成为了集体企业的协调方式,村民从企业中获得非农职业、保障就业和福利回报,进而保持对乡村集体企业的信任和合作^[52]。袁家

村集体企业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涉足房地产、影视、药业、餐饮业、铁路联运等领域,逐步打开了市场化发展的大门。此时,袁家村的产业从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自此,支配袁家村的不再是农业和农民,乡村与传统农业互为需要的关系正在慢慢消解。村民生产、生活中的物质和非物质元素之间发生各式各样的交互作用^[53],促使袁家村的生活环境、土地利用、劳动力结构、村落组织等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逐渐向城市靠拢。“土地收入+企业工资+村集体红利”构成了村民多元的收入来源,村民也从纯粹的农民身份转变成为乡村集体企业的投资者、经营者、职工等,多元化产业发展不仅改变了袁家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松动了原本以血缘、地缘建立起的社会秩序,村民们的活动、交往范围日益扩大,基于集体企业之上的制度规则在经济变迁中成为制约人们日常行为的新方式。这一阶段,其他产业的发展促使袁家村的生产非农化,村民传统的田园农耕生活逐渐褪色,社会关系趋向于外向化的业缘关系,同时,袁家村集体企业生产模式又决定了企业的主体局限于内部的村集体和村民,最终形成了农业与其他产业杂糅、村民离土不离乡、半城市化生活状态的混杂乡村性。

4.1.3 21世纪以来,现代乡村产业化生产主导下的乡村性 2007年,袁家村投资建设了关中印象体验地,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逐步成为全国著名的乡村旅游地,也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旅游带动,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生产^[54]。进入产业化生产的新发展阶段,现代化不断侵入袁家村,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彻底被瓦解,村民的小洋房成为现代富裕生活的空间地标,小汽车成为村民们卷入现代化快节奏生活的隐喻,村民的生产方式从劳动创收转为入股、分红等资本创收,建立在行业共同利益之上的交往已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经历现代化、专业化转型的袁家村,彻底突破了单一农业发展限制,建立起产业共融的闭环产业链,村民从不同产业链条分享更多利润,进而形成了利益均衡化的农村新集体经济发展体系。旅游产业成为了袁家村的主导产业,为了满足市场和消费的需要,袁家村按照“关中民俗”这一主线对自身进行了重塑,农业成为了袁家村发展旅游业的原料供给,关中小吃、农家灶台、驴磨辣椒面、大梁榨油老油坊、黄泥墙房屋、秦腔、皮影等,都被整合成为袁家村农业文化“生存艺术”的景观^[55]。由此,以满足村民内部群体生产生活的袁家村,演变成为满足外部消费者乡村想象与乡村体验的场所,不同个体整合自身的经验,对袁家村的乡村性有着不同解读。这一阶段袁家村是乡村田园与现代生活整合、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共融、集体利益与农户利益均衡的典范,所呈现的是满足外部消费者需要开放式、符号化的乡村性。

4.2 袁家村跨地方发展的过程

2015年伊始,袁家村陆续在西安开业了6家体验店,从乡村的体验地到城市中的体验店,从最日常的馒头、锅盔、面条,再到花样百出的各种小吃,一字之别的体验店成为了消费者体验乡村风味最直接的平台。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坚持传统工艺和本土食材奉献原汁原味的乡村美食,同时通过系列化的管理保证饮食品质,访谈中GLF2提及“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并没有脱离袁家村,只是另一种生产形式,我们依然强调的是食品安全,确切地说我们是通过农民进城捍卫食品安全”。藉由饮食的跨地方生产、经营,传统农耕生产转向现代市场化的农业经济,崇尚现代化、进步和脱贫致富的进步主义和源于“寻根”情怀的浪漫主义^[56]交织在体验店内,原产直供的食材、手工工艺的坚守、原汁原味的袁家村味道、土生土长的袁家村村民,成为可以直观感触到的乡村文化。

4.2.1 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是跨地方生产核心动因 梳理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进城历程,区位限制、游客超载、食品安全问题是袁家村进城开体验店的主要动机缘起。就区

位因素而言,袁家村虽位于西安、咸阳半小时经济圈内,在发展中期,袁家村与西安两地的交通直达车辆班次较少,2012年之后才陆续开通至西安城北、城东、城南、城西四大客运站的直通车,体验店进城极大地便利城市消费者。袁家村进城开店,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袁家村村委会对本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思考,正如GLF1和GLM2所提及:“袁家村发展到一定阶段终究会有一个阶段的瓶颈期,袁家村进城只是想要通过换一种形式让其能够继续往前发展,只是形式的变化,内在的本质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4.2.2 从田野到餐桌实现饮食原真性、安全与健康的协调统一 依托进城开店的方式,袁家村所独有的产品特性、加工工艺、管理模式在新的生产过程得以传承和延续。袁家村本村食材基地生产的面、醋、油、辣椒等嵌入到袁家村饮食产业链,饮食的制作过程中坚持着纯手工制作、现做现卖,设立味道调试小组进行着监督和检查,维持并强化了袁家村饮食的原真。在店铺装饰上,编制类的农具、木质的桌椅、粗犷大气的关中食具,以食物名称命名的档口保持着乡村的淳朴、简单、直接,形成了消费者对体验店原真性的认知和认同。GLM1表明:“每天坚持对顾客进行询问,获得表扬的食品,我们需要解释食品的原材料、加工工艺等背后系列原因,让顾客对袁家村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是建立顾客品牌认可度的一种方式。对于顾客不太满意的,我们也要询问清楚,是哪个点让他不满意,追根到底,即时改正”。“地道”“正宗”也成为了消费者最普遍的评价,也成了袁家村原真性保持的重要体现。

除了原真性的保持,袁家村成功扎根城市消费市场,食品安全的保证成为关键因素。“前店后厂”经营模式,将前台销售空间与后台操作空间对消费者可视化,更加为消费者食品安全感知提供了窗口。“食物不过夜”“食品安全是我们的底线(GLF1)”的系列化管理为食品安全提供了保障,促就了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就食品安全与健康需求达成共识^[57],同时,安全的食品也为袁家村饮食跨地方生产的原真性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推动着跨地方生产情境下饮食安全、原真、健康多维归一的实现^[58]。

4.2.3 物质、人、制度多元流动嵌入跨地方生产过程 伴随着原材料的流动,袁家村的村民凭借着自身技艺一同流入城市空间中,成为跨地方饮食生产过程中核心——以村民为核心。村民是体验店的店铺经营者、管理者,也是整个体验店发展成果的评判者和监督者,更是袁家村跨地方生产过程的主要社会结构系统。在村民的积极参与、“农民捍卫食品安全”的宗旨引导下,实现了袁家村、村民、消费者三者的有机衔接,依托以袁家村为地缘关系的村民群体将乡村社会结构根植在体验店内。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的店长都属于袁家村原住村民,GLM1讲述自己被选为店长的过程提到:“2016年这个店开业,我是这里经营商户,2017年成为这里的店长,一方面是因为我是袁家村本村人,村里的旅游不断发展,村民只有62户,人员过于稀少,精壮的人都被挑出来参与和负责袁家村的发展,外面请的人不了解我们袁家村的历史和发展,也对我们的本土文化理解没有我们自身透彻,作为村民有责任和义务来出来为村里贡献。另一方面,我自身也喜欢琢磨、喜欢思考菜品的味道和工艺怎么样去改进和提升才能更加正宗,因此我便成为了店长,我虽然是农民,但是我想要做好,比城里、比专业的管理做得还要好。”由此可见,袁家村村民被给予了充分的实现空间,而村民自身具备着充足的主体实现能力、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从而形成跨地方生产过程中村、民、店合为一体。

除了物质和人的流动,袁家村的管理制度与模式也一并流入了城市中的体验店,当然,体验店也融合了入驻商城的管理与规范。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并非是简单地复制与重复原有制度体系,而是将制度、规范内化为体验店的新秩序。

综上,转型升级成为袁家村走出乡村的重要推力,食材、村民将袁家村与乡村紧密

联系, 袁家村饮食的原真性、安全和健康在村民与消费者互动得到了协调和统一, 而袁家村原有的制度安排和管理逻辑为整个跨地方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跨地方生产的具体过程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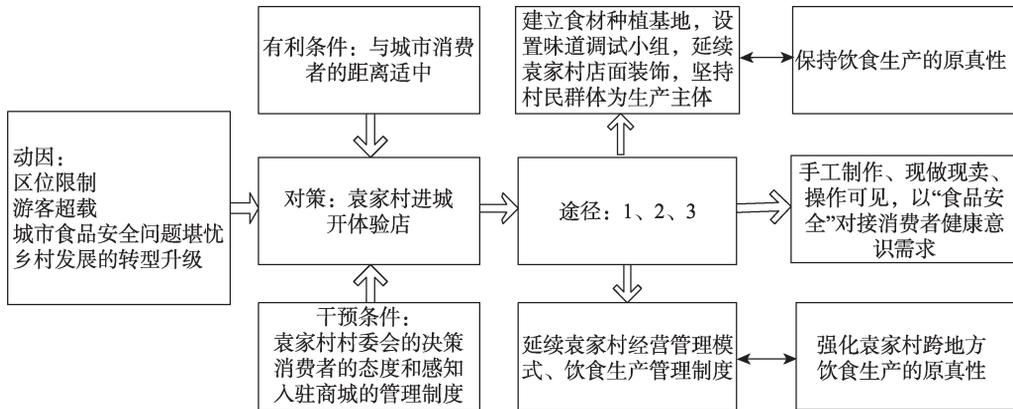


图1 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跨地方生产过程

Fig. 1 The transloc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Yuanjia village Guanzhong impression experience store

4.3 跨地方乡村性的内容呈现

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以饮食的生产和消费连接起乡村和城市, 乡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关系以新的、多元的形式嵌入城市经济、文化网络中, 乡村的内涵在城市力量和本土力量的较量下得以不断地建构^[59]。体验店藉由饮食生产, 将乡村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向城市“反向输出”, 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独特个性——乡村性, 在城市与袁家村本身错综复杂的交织中, 乡村性无法再用传统的人口、距离、就业、土地利用、农业等指标来定义^[60,61], 而是需要将乡村性视为乡村生活、生产、社会关系的系统整合, 以及多元主体符号化的过程。

4.3.1 乡村生产的呈现 体验店的饮食生产依赖于袁家村农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实现, 构成了服务业与传统农业相融合的生产方式。袁家村的地理区位决定了自身的物质存在和村民的饮食特征, 体验店的生产是袁家村生产要素的集中呈现。袁家村通过承包周边村落的土地作为小麦、大豆、辣椒等农作物种植基地, 耕地面积因此扩大, 这就意味着传统农业生产在体验店的发展中得到了强化, 凸显了农业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延续的是“利用袁家村本地农业资源”维持生计的“自立”, 反向证明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和乡村性并未终结^[62], 进而说明乡村性根植于在农业生产之中, 熔铸在乡村农耕文明之中。JYM3提及: “我们是农民, 在这里 (体验店) 改变了我以往种菜种苹果的生活, 但是没有让我变身成为一个商人或者所谓的个体户, 我就是个搞农产品加工的手艺人。”如JYM3所言, 体验店内的袁家村村民, 作为饮食生产者, 将自身村民身份认同嵌入在新的生产活动中, 作为乡村的一种代表和象征甚至是对乡村性的一种定义。因而, 饮食生产并非简单地商业交易, 而是映射袁家村乡村生产的要素集合, 从而成为乡村性的重要表征内容, 刻画了乡村与传统农业的紧密联系、与土地之间的血脉相连以及乡村社会中自力更生的生产逻辑, 饮食成为了展现袁家村农业生产和农耕文明最直接的、可视化的载体。

4.3.2 乡村生活的呈现 生活是乡村性的具身化实践, 是一种以人的实践行为对乡村性的

呈现与塑造^[63]。体验店的生产活动聚焦于袁家村传统的日常饮食，而饮食本身就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是测定乡村性指数的重要评价指标^[64]。“进城开店”改变了袁家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村民从传统农业生产的生计方式中转变为饮食产品的生产者，成为了袁家村乡村发展和乡村产品推广的主要行为者，不变地是村民仍然是靠着自身的个体劳工来获得生计自立，与传统农耕生产下的日常生活遥相呼应。体验店内生产的饮食以面食为主，口味以咸辣、酸辣为主，纯手工制作完成，完全遵照了袁家村传统农业生产下的饮食习惯。食物的命名直接采用原料+制作方法的方式，如“蒸馍”“揪面片”，暗含了村民朴素、直爽的性格。食具普遍使用似盆状的关中老碗，映射了传统农耕生活中，求饱耐饿的生活现实，也暗含了村民粗犷、厚实的生活品性。竹编的农具、木头桌椅、黄土色的店铺等装饰，辅以村民们地道的关中方言，都充分营造了传统关中生活氛围，也成为消费者体验乡村差异化生活的内容。正如XFM1所言：“开放式经营格局，装修风格很有关中民俗文化特色，古香古色中透露着岁月留下的厚重痕迹，经营的都是百姓常吃的家常饭菜，贴近生活又很接地气”。体验店以饮食浓缩了袁家村持久积淀的乡村民俗、生活品性与生活氛围，赋予乡村性以文化意义。

4.3.3 乡村社会关系的呈现 体验店的经营和发展保留了袁家村集体经济模式。村民以技术、工艺等形式入股到袁家村的集体经济中，并通过村集体进行利益的分配，整个的运营管理便是袁家村集体经济的缩影，“村集体”成为了村民们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组织方式。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从一开始就延续着袁家村的集体制度逻辑和制度形式，并将村委会、袁家村管理公司（包括袁家村商业策划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袁家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体验店集体与入驻商城构建的社会关系恰好协调起来，也将整个村集体的经济角色、社会角色和行政角色聚合并赋予在体验店内，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关系被稳固，形成了强有力的乡村社会系统整合能力。依托村民的参与、管理和监督，村民整个的生产、生活纳入到了统一的行动中，并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将体验店与袁家村的乡村自治紧密关联。在体验店内，村民能够有效参与并决定体验店公共事务，特别是对集体及村民的切身利益享有决策权，充分呈现了村民自治的本质特征——主体性^[65]。同时，以村民一致行动能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验店秩序，成为运作有效的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66]。村民通过积极的日常行为成为体验店发展甚至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决策者、管理者，充分体现了村民在利益表达机制中的话语权以及合理恰当地使用话语权的能力^[67]，同时村民群体通过自我监督阐释了与体验店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关系，也使村民群体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共生关系。“我本身是袁家村人，我村里不断发展，我自己在味道这块儿相对而言比较出众，我当这个管理者，不是为了显本事，证明自己能行，纯粹是为了能给村上出一份力。也就是给村上帮忙，现在村上要在外面开这么多产业，外省也有，这么大的摊子，咱村上人不管，全请外面的人管也不是一个事，自己人管放心。”GLM1从袁家村到体验店内的商户再到体验店的管理者，个人的发展与体验店乃至乡村的发展相捆绑，也就使得其在日常管理运作中能够自觉去思考并承担体验店发展和乡村建设的责任。

4.4 跨地方乡村性生产的内在逻辑

4.4.1 权力与资本的扩张 伴随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品牌价值日益凸显，袁家村积累了充足的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资本以其强大的力量推进了袁家村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也成为了袁家村向城市扩张的根本动力。以资本为纽带，袁家村充分整合了自身的各类生产要素，通过村民、品牌、“农民捍卫食品安全”的商誉将袁家村的乡村生产、生活、社会关系整体嵌入到城市输出过程中，完成了袁家村跨地方过

程乡村文化的移植,保障了乡村性在体验店内延续。

袁家村在乡村发展实践中积累出了新集体经济道路,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的高度统一,村民们的个人产权、监督权随之深化,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本质和网络关系得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保持并强化。产权共有、村民共治、发展共享的新集体经济,克服了村民自身经营发展的分散性,很好地对接了农业产业化,也为体验店从食品、服务、氛围、装饰等都保持袁家村原真性文化特色提供了保障。受权力和资本的控制,袁家村在扩张过程形成了闭环产业链,掌握了在城市生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能够在城市多元、异质文化交织中保持自身乡村文化特质,因此成为袁家村保持乡村性的决定因素。同时,村民与袁家村共同体的关系并没有在扩张过程中分离,对袁家村的依赖和认同进一步深化,构成了袁家村跨地方乡村性生产与呈现的社会力量。

4.4.2 标准化生产的转移 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在西安不断扩张过程中各体验店按照统一的标准执行,在市场中形成统一的形象,让消费者普遍认识到袁家村的乡村特色产品和服务的一致性,标准化生产保证了每一家店都是袁家村地道的美食和原真的乡村味道,也使得乡村性成为一种袁家村内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本底。

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饮食生产的标准化转移,包含了生产标准化、味觉标准化和服务标准化系列内容。体验店的食材全部靠袁家村自产供应,由物流团队当日统一配送,从源头上保证了所有体验店之间、体验店与袁家村之间产品的一致性,每一种饮食都按照袁家村当地的制作流程执行,确保了饮食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就食物的味道而言,袁家村“进城开店”前通过举行商户选拔比赛甄选档口的操作人,并由游客、袁家村村委会成员、袁家村相同店面操作人等组成评委,竞选者以最接近袁家村已有同样食品的味道取胜,同时在体验店内设立“味道调适小组”,每周对体验店和袁家村食物味道对比,出现偏差的档口会回袁家村再培训或者直接被淘汰,进而保证了味觉的标准化。体验店服务的标准化源自于袁家村严格的管理和完善的服务培训,GLM1提到:“我们村对我们近乎严苛的管理规定,设立了包括店长选拔、商户代表选拔、食材的供应与采购、菜品味道调试、服务细节、设施设备等一整套的制度体系,我自己也结合这些要求再根据商场对我们的规定,制定了我们日常的管理规定,这些规定都是要在开业之前让所有村民都熟悉和清楚的。在体验店运营过程中,我们每周都会召开一次例会,总结服务过程中过失,还请了专业人员定期对大家进行服务培训”。袁家村系列的、明确的、公开的规范引导体验店日常运营,把体验店的日常纳入统一规范中,保证了体验店紧扣袁家村进行着标准化的生产、运营和发展,保证了每一家店都是袁家村原生产原标准,也使得体验店能够置于袁家村的整体宏观把控之中,保持了原真性和发展的持续性。

体验店的标准化转移不仅意味着生产过程的规范一致,而且暗含体验店内部群体的理解与认同^[68]所构成的更深一层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统一。GLM1提到:“管理没有人情,有人情的管理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我们整个袁家村都是这个理念。我们的郭书记,作为我们的领导,体验店策划之初,他的姐姐想要两个商户名额,郭书记坚定地拒绝了,认为亲戚到了体验店不好管,会影响到整个体验店的运营。他的这种做法为我们树立了传统,成为了我们的标杆,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向他看齐。之前说到,商户代表要自行监督将每天剩下的食材倒掉,要了解我们袁家村这么严苛的管理,熟悉我们的制度,一方面在于我们店里的制度是他们一致同意通过的,并不单单是我一个人、或者我们村委会直接决定的,他也会对比自己在农村那种风吹日晒的劳作生活,也要想明白这么优越的生活和丰厚的收入是靠袁家村来保证的,那我们保证了你的生活,你也是要按规矩来办事才行。”村委书记的领导示范效应、制度的自主性、制度中交织的利益关系

使得村民在日常行为中达成与袁家村的共识，从而渗入到广泛的社会行动领域中，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支撑着标准化实行。

4.4.3 符号化空间的营造 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生产过程以民俗小吃的现场制作、关中传统民居的装饰、袁家村统一的黑白色简约标识牌、“农民捍卫食品安全”“找回记忆中的味道”的宣传标语、乡村传统农耕器具、外露的砌砖灶台、藤条编制的门头以及袁家村原住村民等一系列物质、非物质要素的表达勾勒出袁家村的生活氛围，使得乡村在城市空间中具有可见性^[69]。村民们通过食品安全的捍卫、传统工艺的传统、未改的乡音等自身实践和日常生活行为清晰、明确地重述着乡村^[70]。村民群体的实践活动和自身的文化自觉将袁家村所积淀的地域特性、民俗文化等都转化为符号，映射出村民乡村生活经验的持续整合^[71]。以此整合构成了消费者理解乡村性的重要载体，如木质材料的店铺空间装饰与设计，成为消费者理解“根在乡土”的媒介^[72]。对于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这一独特空间而言，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的牌匾、宣传标语、商标、价格、产品、包装、村民等都成为袁家村符号化的途径（图2）。



图2 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入口处和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陈设农具

Fig. 2 Entrance of Yuanjia village Guanzhong impression experience store and display of farm implements in Yuanjia village Guanzhong impression experience store

注：作者拍摄（拍摄地点：西安市东方亿象城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

体验店的符号象征意义恰巧是消费者所关注的要点^[73]，也成为了消费者选择和认同的缘故。消费者依据自身对乡村生活的想象和记忆，与袁家村的符号化空间形成最真实地对接，表达对接符号的价值认同，正如XFF1提到：“体验店的木桌子木凳子，搪瓷盘子和缺口的面汤碗，地火样子的灶台，浓浓的乡村气息，卖饭做饭的阿姨大叔们就像是老家的大姨二姑，满满的怀念。”通过消费体验，体验店内饮食生产包含的乡村文化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依托对乡村的怀旧情感，消费者将乡村地区传统和落后的形象具象化，成为乡村性想象层面的重要内容^[72]。消费者通过食物的消费、与村民亲密接触，展现出对乡村性相对固定和静态的理解^[74]，表达了“在一个不确定、变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安全、停滞和怀旧”的乡村渴望^[75]。同时，在消费体验的整个过程中都贯穿着村民勤劳、善良、诚信的传统美德和质朴民风等乡村性精神文化。GLF3提到：“村民从面朝黄土、日出而作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但是起早贪黑的忙碌还是照旧。就算是忙碌，我们每周召开例会，每周进行服务培训，就是要保证消费者享受到品质和放心。我们每个体验店的前台放着意见簿，所有的负面意见我们都会通过监控和档口的服务人员去核实，第一时间想办法去跟顾客取得联系进行意见反馈，不止是意见簿上的意见，大众点评上的意见，也都一样。之前有一次，大众点评上连续两天出现了三条负面评价，我们

体验店全体人员在下班后, 连同袁家村的村委书记及管理公司的管理人员都集中在这里(赛格体验店)来开会, 讨论这件事, 并确定解决办法, 最终联系上评论者了解事情真相, 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在消费互动, 通过服务、管理与消费者保持良性互动, 乡村的集体文化和精神明晰可见, 消费者进而对产生乡村性深刻认同(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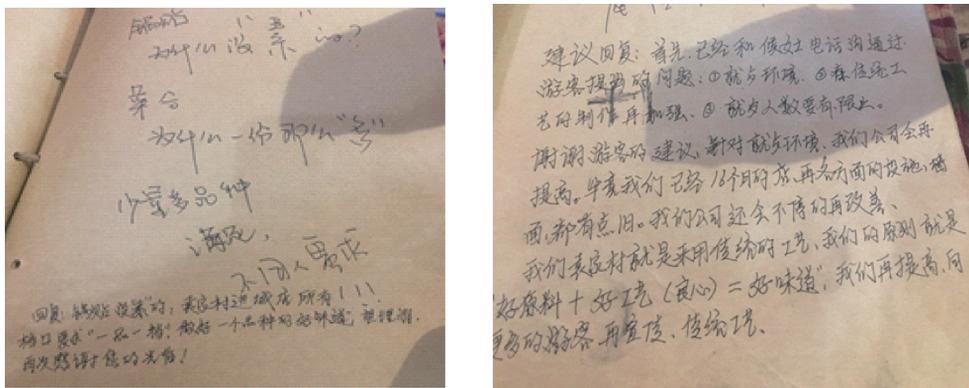


图3 消费者意见簿内容节选与例举

Fig. 3 Excerpts and examples from the consumers' feedback

注: 作者拍摄(拍摄地点: 西安市小寨赛格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 拍摄获得体验店前台工作人员许可)。

4.5 跨地方乡村性的学理阐述 中国人在建立城市之前都生活在村子里, 这一点可以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聚落中得到考证^[76], 因而乡村被视为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77], 乡村性也被认定是中国社会的根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 乡村性也必然在城乡的混杂中呈现出更多元的变化。为此, 本研究从袁家村进城开设体验店的现象出发, 考察从乡村到城市过程中乡村性的重构现状, 试图呈现乡村性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变迁和留存。分析发现, 体验店这样一种新的经济活动形式, 将乡村从村落地域空间中剥离出来, 打破了传统村民与村落聚合关系, 通过饮食生产扩大呈现了袁家村原有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 并以乡村氛围空间的营造来接轨现代社会对乡村的符号消费。

综合乡村性已有研究以及体验店的实证观察, 本研究发现, 乡村性是历时变化的, 与乡村动态发展紧密联系, 乡村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和演化, 决定了乡村性不同阶段的主体特征。跨地方的乡村性存在“生产与消费”“流动与根植”“符号与意义”“传统与现代”的多维交叉关系, 使乡村性在城市空间呈现出杂糅现象, 农业与非农生产杂糅, 传统饮食与现代消费需要杂糅, 就如体验店内的鲜榨果汁, 绝非是袁家村原住民传统的日常饮食内容, 而是基于消费者需要形成, 充分地佐证了传统与现代相杂糅的特征。总言之, 跨地方乡村性的生产与呈现, 反映了乡村性与乡村的辩证关系, 在乡土与城市的较量中, 资本与权力、标准化和符号化保证了乡村性在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传承和延续(图4)。

5 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转型, 是陕西袁家村“进城开店”的宏观背景, 乡村性作为描述乡村地域类型与乡村空间的重要指标^[78]在跨越地域过程中, 不再保持单调和停滞的状态, 而是在城市与乡村、物质与意义、现代与传统交织中流变、混杂。综上调查分析, 本研究结论如下:

(1) 袁家村的乡村性嵌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并呈现历时性变化，也即乡村性并非是固化的结果，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乡村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动态演化，沉淀出了不同的乡村性特征。深入剖析袁家村发展演变历程，发现袁家村经历了关中传统农耕生产主导下的乡村性、乡村集体企业生产主导下的乡村性、现代乡村产业化生产主导下的乡村性变革历程。

(2) 袁家村跨地方生产过程是乡村发展升级助推下，乡村物质、人、制度等因素超越地域边界的流动过程。袁家村进城开店，通过分散化空间布局形成了跨越乡村和城市地域的生产链条和生产体系，原有制度、规范融合城市管理内化为体验店的新秩序，实现了袁家村饮食从田野到餐桌原真、安全与健康的协调统一，进而突破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地域限制条件，对乡村性的演变产生深刻影响。

(3) 袁家村跨地方的过程以饮食生产扩大呈现了袁家村的乡村性，具体包括乡村生活、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多元内容，而乡村性在城市空间成功延续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扩张、标准化生产的转移和符号化空间的营造完成。首先，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以饮食生产将乡村传统农业生产与服务业对接，刻画了传统乡村依附土地、手工劳动实现生计自立的生产逻辑；其次，饮食生产的内容表述了关中乡村传统饮食习惯以及更深一层的生活品性；最后，村集体的经济形式和管理制度，将村民纳入到村落共同体的社会联系中，形成了新的村-民共生关系。而乡村性得以在城市中保持和呈现，主要源自于袁家村自身权利和资本的扩张，占据了生产过程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标准化的生产，保障了生产过程的统一和生产产品的原真性；符号化空间的营造，对接了消费者对乡村空间的想象和情感寄托。

(4) 乡村性是社会建构的，强调不同群体对乡村的意义创造。正如Halfacree所认为的，乡村性存在于乡村的社会实践和村民日常生活中，并被不同社会群体赋予文化意义。回归到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案例，对于以村民、村组织、店铺经营者为核心的内部群体而言，乡村性是内部群体对村落的归属和认同，乡村性是内部群体对乡村生产、生活和关系的空间实践，抑或说乡村性是内部群体的文化根植；对以消费者为主的外部群体而言，乡村性是个体生活经验与乡村之间的持续整合，是对乡村性主观意义化的补充。

当然，全球化与虚拟网络在生产与消费的两端都重塑着乡村性^[59]，消费的多元化和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充斥着“分化”与“变迁”的社会现实下，乡村性的建构与破碎是同步，在乡村性保持的实践中，势必会存在将“乡村性原真性”执行作为一种物质的、静态的、表面化的“风貌”理解^[79]，对乡村性的“真”与“伪”的讨论，更像是现代性的追问，不断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转型相关联，如何在转型发展中避免伪乡村性(pseudo rurality)与失真的乡村性(anamorphic rurality)的出现，乡村性想象和建构的过程中，旅游者、村民、乡村精英、劳工群体和政府管理人员等是否会导致乡村性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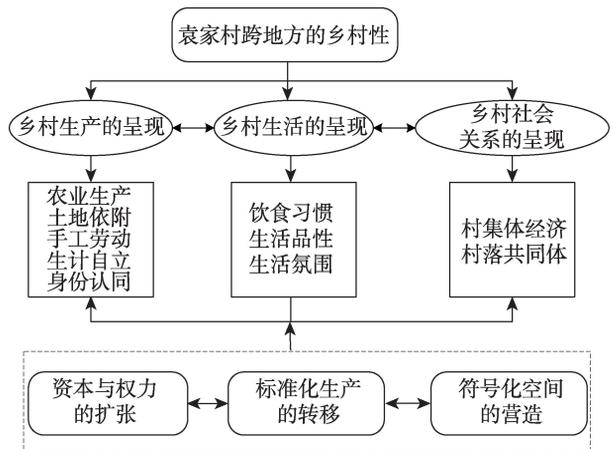


图4 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跨地方乡村性呈现
Fig. 4 The translocal presentation of rurality in the Yuanjia village Guanzhong impression experience store

同的主体层面出现背离, 乡村发展主体迭代之后, 乡村性的“持久”与“短暂”、“存”与“亡”都是乡村性未来研究中亟待关注和解决的理论与现实命题。

致谢: 评审专家对本研究提出客观、准确、详实的修改意见, 尤其是修改过程中针对乡村性内核解构、乡村性动态建构提出了诸多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 受益匪浅, 特致以诚挚感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吕祖宜, 林耿. 混杂性: 关于乡村性的再认识. 地理研究, 2017, 36(10): 59-71. [Lv Zuyi, Lin Geng. Hybridity: Rethinking rural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0): 59-71.]
- [2] 文军, 吴越菲. 流失“村民”的村落: 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 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17, 32(4): 22-45. [Wen Jun, Wu Yuefei. Villages with a loss of villag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reflections on rurality.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7, 32(4): 22-45.]
- [3] Heley J, Jones L. Relational rurals: Some thoughts on relating things and theory in rural stud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3): 208-217.
- [4] Cloke P J. *Country Visions*.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3: 17-20.
- [5] Hedberg C, Carmo R M D. *Translocal Ruralism: Mobility and Connectivity in European Rural Spaces*. Berlin: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1: 17.
- [6] Neal S. Transition culture: Politics, localities and ruralit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3, 32(1): 60-69.
- [7] Hecht S. The new rurality: Globalization, peasants and the paradoxes of landscapes. *Land Use Policy*, 2008, 17(2): 161-169.
- [8] Bosworth G, Somerville P. *Interpreting Rurality: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2013: 16.
- [9] 范学刚, 朱竑. 西方乡村性研究进展. 热带地理, 2016, 36(3): 503-512. [Fan Xuegang, Zhu Hong. Progress in western rurality research in China. *Tropical Geography*, 2016, 36(3): 503-512.]
- [10] 张小林. 乡村概念辨析. 地理学报, 1998, 53(4): 365-371. [Zhang Xiaolin. On discrimination of rural definitio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8, 53(4): 365-371.]
- [11] 李红波, 张小林. 乡村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人文地理, 2015, 30(1): 16-20.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A review and trend on rurality. *Human Geography*, 2015, 30(1): 16-20.]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8-13. [Fei Xiaotong. *Rural China, the institutions for child-bear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8-13.]
- [13] Augé M.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Verso, 1995: 42-74.
- [14] Cloke P J. Country backwater to virtual village? Rural studies and "the cultural tur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3, 19(4): 327-344.
- [15] 白凯, 胡宪洋, 吕洋洋, 等. 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呈现与形成. 地理学报, 2017, 72(6): 1104-1117. [Bai Kai, Hu Xianyang, Lv Yangyang, et al. Study on the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of slow living in Lijia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6): 1104-1117.]
- [16] Chung H.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rurality in Chin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3, 54(5-6): 594-610.
- [17] Ratcliffe M, Burd C, Holder K, et al. Defining rural at the US Census Bureau.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1533270>, 2016-12-09.
- [18] Rogers E M. *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Rural Soci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8: 1-376
- [19] Cloke P J, Marsden T, Mooney P. *The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2006.
- [20] Cloke P J.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 *Regional Studies*, 1977, 11(1): 31-46.
- [21] Harrington V, Dan O.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1981 rurality index. *Sociologia Ruralis*, 1998, 38(2): 178-203.
- [22] Mormont M. Who is rural? or how to be rural: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he rural. In: Marsden T, Lowe P, Whatmore S. *Rural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c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 London: David Fulton Publishers, 1990.
- [23] Halfacree K H. Locality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Space, discourse and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the rur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3, 9(1): 23-37.
- [24] Halfacree K H. Rethinking "rurality". In: Champion A G, Hugo G. *New Forms of Urbanization: Beyond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3: 1-24.

- [25] Murdoch J, Pratt A C. Rural studies: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rural".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3, 9(4): 411-427.
- [26] Gray J. Rural space in Scotland: From rural fundamentalism to rural development. *Anthropological Journal on European Cultures*, 2000, 9(1): 53-79.
- [27] Sharpley R, Sharpley J. *Rural Touris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 1997: 18.
- [28] Liu Z, Liu 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livelihood transition in the east coastal reg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suburban Shanghai.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3(2): 145-158.
- [29] Madsen L M, Adriansen H K.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rural space: The need for multi-method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4, 20(4): 485-497.
- [30] Pred A.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 74(2): 279-297.
- [31] Seamon D. Body-subject, time-space routines, and place-ballets. In: Buttimer A, Seamon D.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148-165.
- [32] 孙九霞, 周尚意, 王宁, 等.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 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 *地理研究*, 2016, 35(10): 1801-1818. [Sun Jiuxia, Zhou Shangyi, Wang Ning, et al. Mobility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Time, space and socie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0): 1801-1818.]
- [33] C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9-10.
- [34] Grillo R, Riccio B. Translocal development: Italy-Senegal.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4, 10(2): 99-111.
- [35] Oakes Tim, Louisa Schein. *Translocal China: Linkages, Identities and The Reimagining of 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06: 20.
- [36] Brickell K, Datta A. *Translocal Geographies: Spaces, Places, Connection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11: 19.
- [37] Mcfarlane C. Translocal assemblages: Space, power and social movements. *Geoforum*, 2009, 40(4): 561-567.
- [38] Greiner C, Sakdapolrak P. Translocality: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emerg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Geography Compass*, 2013, 7(5): 373-384.
- [39] 袁振杰, 朱竄. 跨地方对话与地方重构: 从“炼狱”到“天堂”的石门坎. *人文地理*, 2013, 28(2): 53-60. [Yuan Zhenjie, Zhu Hong. Translocal dynamic and the local reconstruction: From "Purgatory" to "Heaven" in Shimenkan.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53-60.]
- [40] Gielis R. A global sense of migrant places: Towards a place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2009, 9(2): 271-287.
- [41] Greiner C, Sakdapolrak P. Rural-urban migration, agrarian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Kenya: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013, 34(4): 524-553.
- [42] 李健, 宁越敏, 汪明峰. 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分析: 兼论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地理学报*, 2008, 63(4): 437-448. [Li Jian, Ning Yuemin, Wang Mingfe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computer industr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4): 437-448.]
- [43] 曾国军, 孙树芝, 朱竄, 等. 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背后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 基于广州的案例. *地理科学*, 2013, 33(3): 291-298. [Zeng Guojun, Sun Shuzhi, Zhu Hong, et al. Translocal restaurants' 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the paradox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ty: Case studies from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3): 291-298.]
- [44] 马海涛, 刘志高. 地方生产网络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 以潮汕纺织服装行业为例. *地理科学*, 2012, 32(3): 308-313. [Ma Haitao, Liu Zhigao.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local production networks: A case study of Chaoshan region in Southeast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3): 308-313.]
- [45] 苗长虹. 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 以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为例. *地理学报*, 2006, 61(4): 425-434. [Miao Changhong. Global-local nexus and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 A case study of hair-goods industry in Xuchang, Henan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4): 425-434.]
- [46] 蔡宁伟, 于慧萍, 张丽华. 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在案例研究中的应. *管理学报*, 2015, 28(4): 66-69. [Cai Ningwei, Yu Huiping, Zhang Lihua. The application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 case stud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28(4): 66-69.]
- [47] Minichiello V, Aroni R, Timewell E, et al. *In-depth Interviewing*. South Melbourne: Longman, 1995: 8.
- [48] Cloke P J. Rurality and racialised others: Out of place in the countryside?. In: Chakraborti N, Garland J. *Rural Racism*. Cullompton: Willan Publishing, 2013: 17-35.
- [49] 何军. 关中农村发展变迁研究.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12-13. [He Jun. Study on the rur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Guanzhong region in Shaanxi province. Yangl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2006: 12-13.]
- [50] Marsden T, Lowe P, Whatmore S. *Rural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c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 London: David Fulton Publishers, 1990: 1-199.
- [51] 毛丹, 王萍. 英语学术界的乡村转型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14, 29(1): 194-216. [Mao Dan, Wang Ping. The evolution of

- western rural restructuring research.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4, 29(1): 194-216.]
- [52] 渠敬东. 占有、经营与治理: 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 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 *社会*, 2013, 33(1): 1-37. [Qu Jingdong. Possession, 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as three conceptual dimensions of town 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An attempt back to the classical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 33(1): 1-37.]
- [53]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 [54] 邓涛. 农业产业化生产形成条件分析. *农村经济*, 2006, (4): 42-44. [Deng Tao. Analysis of forming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ed production. *Rural Economy*, 2006, (4): 42-44.]
- [55] 彭兆荣.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土性”景观.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141(3): 22-27. [Peng Zhaorong. The locality landscape 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8, 141(3): 22-27.]
- [56] 王宁. 传统村落的地理嵌入性、地理脱嵌性及其社会保护机制. *旅游学刊*, 2017, 32(2): 1-3. [Wang Ning. The geographical embeddedness, geographical disembeddedness and social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ourism Tribune*, 2017, 32(2): 1-3.]
- [57] Tikkanen I. Maslow's hierarchy and food tourism in Finland: Five cases. *British Food Journal*, 2007, 109(9): 721-734.
- [58] Goodman D. Ontology matters: The relational materiality of nature and agro-food studies. *Sociologia Ruralis*, 2001, 41(2): 182-200.
- [59] 吴昕晖, 袁振杰, 朱竑. 全球信息网络与乡村性的社会文化建构: 以广州里仁洞“淘宝村”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5, 47(2): 115-123. [Wu Xinhui, Yuan Zhengjie, Zhu Hong.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rurality: A case based on "Taobao" village in Guangzhou.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5, 47(2): 115-123.]
- [60] Cloke P J, Edwards G.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1: A replication of the 1971 index. *Regional Studies*, 1986, 20(4): 289-306.
- [61] Bryant L, Pini B. *Gender and Rur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37-142.
- [62] 张勇, 冯健. 村落终结: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空心化与乡村性演化.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24(9): 104-114. [Zhang Yong, Feng Jian. The vanishing village and evolving rurality in urbanizing China.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7, 24(9): 104-114.]
- [63] 陶伟, 王绍续, 朱竑. 身体、身体观以及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 *地理研究*, 2015, 34(6): 1173-1187. [Tao Wei, Wang Shaoxu, Zhu Hong. The body, the view of body, and the study of body in human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6): 1173-1187.]
- [64]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地理学报*, 2009, 64(4): 427-434. [Long Hualou, Liu Yansui, Zou Jian.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4): 426-434.]
- [65] 程为敏. 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3): 126-133. [Cheng Weimin. Some thought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5, (3): 126-133.]
- [66] 贺雪峰, 仝志辉. 论村庄社会关联: 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3): 124-134. [He Xuefeng, Tong Zhihui. On social solidarity of villages: Also on the social basis of village order.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2, (3): 124-134.]
- [67] 庄晓平, 尹书华, 朱竑. 旅游发展对古村落村民公民性建构的影响: 以开平古碉楼群为例. *地理学报*, 2018, 73(8): 179-193. [Zhuang Xiaoping, Yin Shuhua, Zhu Hong.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for ancient village residents in rural China: The case study of Kaiping Diaolou Complex.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8): 179-193.]
- [68] Blau P.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17: 56.
- [69] Woods M. 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1(4): 485-507.
- [70] Ricoeur P. Imagination in discourse and in action. In: Gillian R, John F R. *Rethinking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6: 3-22.
- [71] Ness S A. Tourism-terrorism: The landscaping of consumption and the darker side of place.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5, 32(1): 118-140.
- [72] Kordel, Stefan. Selling ruralities: How tourist entrepreneurs commodify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ways of concei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 Society*, 2016, 25(3): 204-221.
- [73] 葛绪锋, 张晓萍. 基于符号学理论的旅游文化景观的符号营销: 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 *旅游研究*, 2013, 5(3): 39-42. [Ge Xufeng, Zhang Xiaoping. The symbolic marketing of tourism cultural landscap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miotics: Taking Wuhua district, Kunming as an example. *Tourism Research*, 2013, 5(3): 39-42.]
- [74] Benson M. Living the "real" dream in la France Profonde? Lifestyle migration, social distinction, and the authenticities

- of everyday lif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2013, 86(2): 501-525.
- [75] ShortB. Idyllic ruralities. In: Cloke P J, Marsden T, Mooney P.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2006: 133-148.
- [76] 王铭铭. 走在乡土上: 历史人类学札记.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Wang Mingming. *Walking on the rural: Notes 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77]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0. [Liang Shuming. *The Theory of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10.]
- [78] Woods M. 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sing rur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1, 34(6): 835-846.
- [79] 徐红罡, 万小娟, 范晓君. 从“原真性”实践反思中国遗产保护: 以宏村为例. *人文地理*, 2012, 27(1): 107-112. [Xu Honggang, Wan Xiaojuan, Fan Xiaojun. Rethin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thenticity in China's heritage conservation: A case study of Hongcun village. *Human Geography*, 2012, 27(1): 107-112.]

Translocal rurality 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Yuanjia village of Shaanxi province

HUANG Qingyan^{1,2,3}, BAI Kai^{1,2,3}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Shaanxi Tourism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Laboratory, Xi'an 710119, China; 3. 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Tourism Informatics,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going to the town to do business" identified by Yuanjia village stands out as a paradigm of translocal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Taking this pattern of Yuanjia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of daily life in the sto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tore operators, consumers and managers, explores the translocal rurality 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in the village and examines how it is constructed and e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 rurality of Yuanjia village is embedd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and presents a diachronic change, that is, the rurality is not the result of solidification, but a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2) Driven by the upgrading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transloc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Yuanjia village is a flow process of rural material, human, institution and other factors across regional boundaries, which is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ultiple relationships of consanguinity, industry network and region network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he city. (3) The translocal process of Yuanjia village presents the rurality with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rural life, r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food production. The continuation of rurality in urban space is completed by the expansion of power and capital, the transfer of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ymbolized space. (4) Rurality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ce cre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to the countryside. The phenomenon of Yuanjia village's "going to the town to do business" transcends the rural boundary, but it has a deeper and stronger connection with agriculture, land and village collective, which strongly retorts the conclusion of "the end of the village" and "the end of the ruralit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emphases on understanding rur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m, dynamics and integration will help to experience more authentic rurality in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a new thinking for the rural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Keywords: rurality; translocal; authenticity; standardization; Yuanjia village, Shaanxi province